

【论 文】

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天下

——清代西北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¹

朱玉麒²

摘要：清代西北边疆的平定贯穿康雍乾三朝，历次取得的胜利都举行隆重的凯旋庆典。这些庆典礼仪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传统汉文化中固有的军礼组成，即在边疆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点立碑纪功，以及在京师安排告祭天地、祖宗和万物神灵，举行隆重的献俘、受俘仪式；二是依托于古代经典《礼记》的制度理想，而向孔子举行祭祀并建立告成碑于太学之中。告成太学是清代军礼的仪式重建、是释奠礼完成状态的首次实现。它利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与官学二元一体的教育体制，向全体汉族知识精英传达了新的帝国疆域与民族构成，努力构建一个新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体系。

关键词：清代 西北边疆 平定 告成太学 礼仪重建

一、引 言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西北边疆的平定成为当务之急，康雍乾三世因此屡屡用兵，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告成功。乾隆时期的西北平定，主要以二十年平定达瓦齐、二十二年平定阿勒尔撒纳、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为标志，从而全面拥有了天山南北辽阔疆域的统治权。在乾隆晚年回忆一生所取得的奠定帝国版图的战争中，以“平准噶尔、定回部”的三次战役所完成乃祖、乃父的未竟之业为“十全武功”之首（乾隆《御制十全记》）³。

在西北平定战争的每一次胜利之后，乾隆都会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来作宣告。留存到后世的纪功碑、平定战图、平定方略以及西域舆图和图志、同文志等，均作为战争的纪念物，彰显了清代前期建立新的疆域范围和民族共同体并促成帝国共识的努力。

在西域，平定战争结束多年之后，竖立其地的纪功碑确实成为后世凭吊与吟咏的对象。乾隆四十六年谪戍新疆的前黄梅知县曹麟开（生卒年不详），就曾在乌鲁木齐写下《塞上竹枝词三十首》，其中一首吟咏竖立在伊犁格登山（今新疆昭苏边界松拜河东岸）上的平定准噶尔纪功碑：

永和贞观碣重重，博望残碑碧藓封。何似御铭平准绩，风云长护格登峰⁴。

在清代前期平定西北的行军过程中，曾经发现过永和二年（137）东汉战胜匈奴而建立的《裴岑纪功碑》和贞观十四年（640）唐代为攻克高昌国而建立的《姜行本纪功碑》，甚至还有伊塞克湖畔的《张骞碑》⁵。但在诗人看来，这些记载都不如乾隆平定准噶尔的丰功伟绩，以至于御制的格登山纪功碑至今都得到天地风云的保护。

无独有偶的是，另一位诗人王曾翼（1733—1794）在乾隆五十年以兰州兵备道的身份抚谕天山南路时，也写下《回疆杂咏三十首》，其中一首吟咏了他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所见平定回

¹ 本文原载东方学研究论集刊行会编辑，《高田时雄教授退休纪念东方学研究论集（中文分册）》，京都：临川书店，2014年6月2日，397-411页。此稿有增补。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³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一四，《清实录》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018页。

⁴ 星汉编著，《清代西域诗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86页。

⁵ 参见笔者，《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文史》2005年第4辑，125-148页。



部的纪功碑：

霍占巢穴剩荒基，断础零砖拾烬遗。扫荡凶氛归化宇，卿云长护御书碑¹。

诗歌末句表达对乾隆纪功碑的歌颂方式，与曹麟开如出一辙。这里的御书碑，指的是乾隆皇帝御制的《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叶尔羌）碑》。

在战争的发生地发现纪功碑，从一般的常识来看，并不值得奇怪；但是，当我们发现乾隆年间的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在担任广东学政时期编著的《粤东金石略》，已经著录了距离西北战场万里之遥的广州府学所立平定西北的告成太学碑时²，疑问自然发生。

本文的研究，便从这里切入到清代西北边疆平定的凯旋礼仪建置中。

二、纪功碑与告于庙社——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在边疆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点立碑纪功，是清代军礼重要的凯旋仪式之一。因此乾隆皇帝平定西北边疆的纪功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回部勒铭伊西库尔淖尔碑》、《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被分别修建于天山南北的重镇宁远城（即固尔札，清代伊犁九城之首，今伊宁市）、叶尔羌，以及取得平叛大捷的格登山、伊西库尔淖尔（今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穆尔加布区西南）。

这一形式，可以看作是对其祖父康熙皇帝在亲征经过地方立碑行为的继承。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入侵，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曾经御驾亲征，最后一次抵达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部署军务，因此于四十二年御制《敕赐归化城崇福寺碑记》的纪功碑文，分别立石于曾经驻蹕的崇福寺（小召）和参加诵经法会的席力图召寺（延庆寺）。其立碑的目的，也在碑文中明确书写：“书此勒石，俾后之览者知朕不憚寒暑、三临绝塞、为民除残之意”³。

而事实上，竖立纪功碑是古已有之的边疆战争纪念方式。秦始皇的东封刻石，是其原始。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以来，多次东巡郡县，分别在峯山、泰山、之罘、东观、琅琊、碣石、会稽等处立石题记。这些刻石的重要功能，是“颂秦德”，表达其统一宇内、包有东南沿海的功德。而由此延伸出来的边塞战争奏捷的刻石纪功，则可以追溯到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抗击匈奴而由班固撰写的《封燕然山铭并序》。此后在汉唐以来的边疆战争中，刻石纪功的文献记载与实物发现，都印证了对“燕然勒石”这一纪功形式的继承⁴。清代前期，从康熙亲征的《敕赐归化城崇福寺碑记》⁵，到五十九年平定准噶尔侵扰西藏而于雍正二年（1724）立在拉萨的《御制平定西藏碑》，无疑都是这一传统表达方式的延续。如上所揭，平定西北的战争之后，乾隆效法乃祖的方式而变本加厉，在西域所立纪功碑多达五处⁶，其中《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和

¹ 星汉辑注《清代西域诗辑注》，138页。

² 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卷首，乾隆三十六年序刻本，叶六正、背。按，《粤东金石略》卷首所载广州府学御碑亭内平定碑凡四：《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

³ 这一俗称“平定噶尔丹纪功碑”，可参见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噶尔丹叛乱的覆灭”，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5-56、164页。

⁴ 参笔者《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同注3。

⁵ 在此之前，康熙还有仿照勒铭燕然的方式，在战争经行和取得胜利的地点察罕七罗、拖诺山、昭莫多、狼居青山山刻写铭文的行为，参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九〇，《清实录》第5册，1016-1017页。

⁶ 以往中国大陆关于这些碑刻的研究，可参见史棣祖，《清朝平定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及其意义：从新疆昭苏县格登山石碑谈起》，《文物》1976年第12期，59-67页；肖之兴，《葱岭上的乾隆纪功碑》，《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126-128页；李之勤，《格登山碑杂考》，《新疆大学学报》，67-72页；收入作者著，《西北史地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429-434页；周轩，《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碑文浅释》，《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73-79页；杨天在，《伊犁地区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5期，35-37页；杨永平，《格登山碑文考证译释》，《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59-62页；布莉华，《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解说与补正》，《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52-54

《平定回部勒铭伊西库尔淖尔碑》在晚清的中俄交涉中，成为边界争论的焦点，因此也更为世人所知晓。

但是，边疆平定的奏凯军礼，其重头戏还在京师，那就是告成和劳师之仪。与本文讨论相关的是告成仪式，其在京师的又分为两个阶段。

告成仪式的第一个阶段是在捷报传来、不待班师即予举行的祭祀仪式。这种祭祀，是对出征以前向天地神祇、列祖列宗拜祭而许下诺言的还愿行为。如《左传》所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¹为了获得战争天赋神授的正义性和必胜信念，出征之际通过祭祀来达到坚定军心的目的，这是从上古鬼神崇拜遗留到宗法社会的重要规则。祀是祭祖，戎是战争前的祭祀，其实都是在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²。祭天是皇帝的特权，作为天子，是天命的继承人，因此战争的胜利首先归功于上苍乃至万物神灵，需要在天坛、社稷坛等特定的场合举行祭拜天地神祇之仪；而皇位是受命于祖先，故祭拜天地万物之后，则通过祭拜太庙与祖陵来表达对祖先的告慰。正如《清实录》记载乾隆皇帝在二十年五月壬辰（十九日）得到平定准噶尔的捷报之后所表述的那样：“今虽值此捷奏频仍，遐荒底定，而朕心初不以为喜，惟有感戴上苍福佑，列祖贻庥。”³这一叙述虽不免矫情，但“上苍福佑，列祖贻庥”所表达对上天、祖先的感戴，在宗法祭祀的时代，仍然应该相信是其真实而虔诚的心理。

在清代，这些祭祀行为确实都在战争的捷报传来之后即予举行。如乾隆皇帝于捷报得到的第二天（五月癸巳，二十日），即传谕派皇子永璋、永琪、永璘祭告关外三陵（努尔哈赤的福陵、皇太极的昭陵以及清远祖的永陵）和关内三陵（顺治孝陵、康熙景陵、雍正泰陵）的事宜⁴。而他自身则从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子（二十七日）起，“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斋戒三日”，至六月癸卯（一日），“告祭太庙，上亲诣行礼”⁵。此后又在六月己酉（七日）传谕：“平定准噶尔捷闻，……朕仰承先烈，集此大勋，保泰持盈，弥深兢业，亲告成功于太庙，郊、社、岳、渎诸祀，次第遣官敬谨举行，以昭茂典。”⁶亲诣太庙、派官告祭天地万物诸神的安排，充分显示了他对祭祀仪式的虔诚用心。

告成仪式的第二个阶段是大兵凯旋后的献俘仪式，即献俘礼。这是从周武王灭商而告庙献俘即已有之的仪式，魏晋以后重新为历朝所遵循，而北周则进一步确定为“献俘于太庙”的制度；到了唐朝，边疆战争尤其重视献俘礼的举行⁷。如《唐会要》所载西北战争中，贞观四年张宝相俘颉利可汗，献俘于太庙；二十三年阿史那社尔执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献于社庙；永徽元年（650）高侃执突厥车鼻可汗，献太庙；显庆三年（658）苏定方俘贺鲁，献于昭陵、告于太庙……⁸。这些都是献俘太庙的实际例证。帝王往往利用这一对外公开的献俘仪式，来宣扬国威、昭示怀柔，体现其话语权的实录等政书体国史，对此当有详细的记载，以至于后来的正史得以充分描写，如东突厥颉利可汗事，《新唐书·突厥传》载：

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仗卫，士民纵观，吏执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国破，赖隋以安，不以一镞力助之，使其庙社不血食，一也；与我邻而弃信扰边，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携怨，三也；贼华民，暴禾稼，四也；许和亲而迁延自遁，五也。朕

页。

¹ 《左传》“成公十三年”条，《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911页。

² 具体解释，可参见王学军、贺威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92-98页。

³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八九，《清实录》第15册，134页。

⁴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八九，《清实录》第15册，136-137页。

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八九、四九〇，《清实录》第15册，144、150页。

⁶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九〇，《清实录》第15册，159-160页。

⁷ 相关概括，可参见盖金伟，《“献俘礼”与“北庭大捷”质疑》，《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52-57页。

⁸ 《唐会要》卷一四《献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371、372页。



杀尔非无名，顾谓上盟未之忘，故不穷责也。”乃悉还其家属，馆于太仆，禀食之。……遂授右卫大将军，赐美田宅¹。

又如西突厥别部突骑施可汗苏禄之子吐火仙骨啜与其弟叶护顿阿波，于贞观十三年被碛西节度使盖嘉运联兵破于碎叶城而受擒，《新唐书·突厥传》也记载：“嘉运俘吐火仙骨啜献太庙，天子赦以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脩义王，顿阿波为右武卫员外将军。”²凡此种种献俘的仪式，都是帝王为展示宽大为怀的统战需要而创立的仪式。

这种献俘礼仪，同样为清代边疆平定的凯旋仪式所继承。据《清实录》记载，献俘仪式在雍正二年（1724）平定青海之际确立，并分献俘、受俘两个步骤：

（雍正二年四月）癸亥，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青海大捷，应献俘于太庙，恭请皇上临御午门受俘。”得旨：“平定青海，实乃皇考留贻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景陵。今造逆首恶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三人槛送来京，朕令议献俘太庙之礼，以慰列祖在天之灵。诸王大臣等乃议请受俘，归功于朕，非朕本意也。可否只行献俘，不行受俘之礼？诸王大臣等再察典礼具奏。”寻议：“出师凯旋，执获丑类，献于庙社，即受俘于廷，历代行之，大典攸昭，应请允行。”从之³。

（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以平定青海所获叛逆俘囚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三人解送至京，行献俘礼，遣官告祭太庙、社稷。……丙戌，王以下文武百官齐集午门前，设卤簿，鸣金鼓，上御午门楼前楹，升宝座受俘。兵部官率解俘将校，将平定青海所获叛逆俘囚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三人白练系颈，跪伏。兵部堂官奏：“所获俘囚，谨献阙下。”上命交刑部，于是刑部官领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文武各官行礼毕，上回宫⁴。

《清朝通典》也记录了雍正二年的献俘仪式：

雍正二年，命将讨平青海，解送俘囚至京师，择日献俘于太庙、社稷。

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世宗宪皇帝御午门受俘。是年，定献俘次日行受俘礼仪注⁵。

从以上二书的记载可知，雍正年间的献俘、受俘分离为两个仪式，是经过了皇帝与大臣讨论后确定。当时这两个仪式的时间相隔三天，不过，又制定了以后在献俘次日行受俘礼的规定。这一献俘于太庙和社稷、次日受俘于午门的礼仪，确实为乾隆所继承。《清朝通典》记录了乾隆四十一年以往的历次献俘和受俘情形：

乾隆十四年，议定献俘之仪：“凡出师克捷，如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之礼，以俘献于太庙、社稷。”二十年六月，擒获叛逆巴朗、孟克特穆尔并雍正年间叛逃之罗卜藏丹津，献俘于太庙、社稷，悉如雍正二年之礼。十月，平定准噶尔，擒获达瓦齐，献俘行礼，亦如之。仪具《大清通礼》。

乾隆十四年，定出师克捷、于献俘次日行受俘礼，均如雍正二年之仪。二十年六月，擒获巴朗、孟克特穆尔、罗卜藏丹津，以俘来献，皇上御午门受俘，悉如雍正二年议定之礼。有赦而不杀者，奉旨释缚，交理藩院。十月，平定准噶尔，擒获达瓦齐，皇上御午门受俘行礼宥罪仪，与二十年同。二十五年正月，平定回部，函霍集占之首以献，皇上御午门受俘献。四十一年四月，平定两金川，生擒逆首索诺木等七人，并函送逆首僧格桑首级，献于阙下，皇上御午门行受俘礼。是年，奉谕礼部等：“所奏二十八日受俘仪注，将军等应入百官班内，在午门前行礼，但将军等于郊劳及凯燕两次俱有行礼之处，受俘时将军及自军营回京之在御

¹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035-6036页。

²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下，6068页。

³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八，《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306页。

⁴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九，《清实录》第7册，312、314页。

⁵ 《清朝通典》卷五九“礼·军·献俘、受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2443页。



前乾清门行走者，俱着扈从登午门楼，不必入班行礼，止须令福康安带领押俘将校等在午门前行礼。”其仪注具《大清通礼》¹。

以上礼仪由乾隆十四年第一次平定金川开始，均继承雍正二年所定，但也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宥罪、将军扈从登午门等等仪式。《清实录》的相关记载更为详细，如达瓦齐事：

乾隆二十年十月丁巳（十七日），俘酋达瓦齐、罗布扎、莽喀、图巴、敦多克、和通等，解送至京。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由长安右门入，进天安右门，至太庙街门外，向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令俘向北跪，告祭大臣进太庙行礼。毕，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至社稷街门外，令俘仍向北跪，告祭行礼，如前仪。……戊午（十八日），上诣皇太后宫问安。御午门楼，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铙歌大乐，金鼓全作，兵部堂官以解到俘酋达瓦齐、罗布扎、莽喀、图巴、敦多克、和通等，跪奏请旨。命达瓦齐等著免交刑部，俱交理藩院。理藩院堂官跪领旨，押俘出天安右门，王公百官行庆贺礼²。

文字记录犹嫌不足，对于这些仪式所显示的“天朝”胸怀，乾隆皇帝还策划了中国和西洋的宫廷画家为之画图存照。如曾经著录于《石渠宝笈》、近年以昂贵的价格拍卖出来的徐扬手绘《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即是对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回部献俘馘礼的情景描绘³。这一仪式更由乾隆皇帝敕命法国人耶稣会修士 Denis Attiret（王致诚，1702-1768）绘制，后来被刻成铜版十六幅之一流传⁴；而包含这一仪式的、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丁观鹏手绘《平定伊犁回部战图》二十幅，也是那个时期完成的作品⁵。

献俘礼在京师太庙和社稷坛的完成，也象征了对于天地、祖先告祭的最终完成，成为告成军礼的高潮和终结。从纪功碑到凯旋告祭这一切完备的礼仪，可以看作一个盛世所确立的、继承历代汉文化传统祭祀仪式的踵事增华。

但这还不是全部！

从捷报传来开始，一个本质性的变化贯穿在告成仪式的始终，那就是告成碑和释奠太学的仪式出现，反映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在告成礼建置上登峰造极的状态。

三、告成碑与释奠太学——复古名义下的创新

作为战争纪功碑的一种新形式——“告成太学碑”在康熙三十七年首次出现。这就是竖立在太学即国子监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清实录》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乙巳，）先是，上亲征朔漠，荡平厄鲁特噶尔丹，诸王大臣等请立碑太学，以垂万世。至是，御制碑文曰……⁶。

康熙的碑文本身也对这一事件做如此叙述：

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释眚灾，洁事禋望，为亿兆期升平之福，而廷臣请纪功太学，垂示来兹。朕劳心于邦本，尝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顾兹武略，廷臣金谓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绩于有永也。朕不获辞，考之《礼·王制》有曰：“天子将出征，受成

¹ 同上注，2443页。

²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九九，《清实录》第15册，273-274页。

³ 《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手卷，设色纸本，纵42厘米，横1800厘米，2009年10月17日，在北京中贸圣佳拍卖会上，以1.34亿元人民币成交。参聂崇正《观徐扬画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卷》，《收藏家》2009年第3期，32-34页。

⁴ 高田时雄，《平定西域战图解说》，京都：临川书店，2009年；谭皓中译本载《西域文史》第六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301-313页。

⁵ 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119-124页。他如平定金川的献俘图，也都有徐扬的绘本和据捷克人耶稣会神父 Ignace Sicherbart（艾启蒙，1708-1780）绘本刻制的铜版画行世，此处不赘。

⁶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九〇，《清实录》第5册，1015页。



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讫告。”而泮宫之诗亦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又《礼》：“王师大猷，则奏凯乐，大司乐掌其事。”则是古者文事、武事为一，折冲之用，俱在樽俎之间，故受成、献馘，一归于学，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向意于三代，故斯举也，出则告于神祇，归而遣祀阙里。兹允廷臣之请，犹礼先师以告克之遗意，而于六经之指为相符合也。爰取“思乐泮水”之义，为诗以铭之，以见取乱侮亡之师，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实，或者不戾于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尔¹。

以上占据了碑文一半篇幅的文字，都在申说告成碑的撰写是因为廷臣的请求，并表现出不肯居功自傲的低调姿态。其实这是帝王虚饰的套语，从纪功碑的源头秦始皇起，其东封刻石也都充斥了“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琅琊台刻石》）、“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之罘刻石》）这样的用词²。《清实录》和康熙碑文的这种说法，也可以看作是虚矫文辞的一种“用典”。而其他喋喋于符旨六经的典故运用，则正符合其在所有的场合不断标榜的上承三代、儒家立国宗旨。

《清史稿》对康熙凯旋仪式的完整描述是：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征噶尔丹，破之，还蹕拖诺，捷入，焚香谢天。……帝谒堂子如仪。明年，朔漠平，班师亦如之。还宫后，遣祭郊、社、宗庙，遍群神，谒陵寝，御殿受贺。直省官咸进表文，颁诏如制。帝自勒铭镜石，并建碑太学云³。

可见，康熙是在完成了为历代所践行的祭告仪式之后⁴，加上了建碑太学这一内容⁵。其建立告成太学碑的经典依据，是《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祗，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讫告。”⁶作为对周朝礼仪制度的理想型还原，《礼记·王制》对天子出征的军礼做了如上规定。但如前所揭，军礼中的凯旋之仪在春秋以来凋零而重新恢复，告于庙社这一内容一直作为军礼的核心而被历代沿袭，而释奠告成于学的内容，却并没有在历代受到重视。而且周礼的所谓学，是各尊其师以为学，并非以孔子为唯一的先师。尊孔子为先圣、先师，并建立太学释奠礼仪祭孔，是唐代以来被完善的⁷。因此在军礼衰而又兴的过程中，以孔子为素王而不与武事，在军礼中舍弃释奠于孔庙的行为并非不正常。

孔颖达概括《礼记》中的释奠礼仪云：“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于学，六也。”⁸康熙在平定朔漠的凯旋军礼中“遣祀阙里”之后又“告成太学”的作为，可以说是在祭孔礼仪中第一次真正完整了六种释奠礼。这不仅反映了他在以儒家思想为立国根本的指导意识下，一方面是为其武力的征服寻找合理的解释，所以强调“古者文事、武事为一”；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也有超迈前代而直接周统的意愿表达⁹。乾隆皇帝对乃祖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之后的《涿鹿行迭去岁韵》诗中，有“献功将为

¹ 同上注，1016页。

²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47、249页。

³ 《清史稿》卷九〇“礼·军礼”，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766页。

⁴ 其中“帝谒堂子如仪”的堂子，是清帝祭神之所，可以看作是清代皇帝在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军礼中保存的满族特色的祭祀行为。魏源《圣武记》卷一二：“《会典》：皇帝拜天则于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则堂子自是满洲旧俗，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3册，519-5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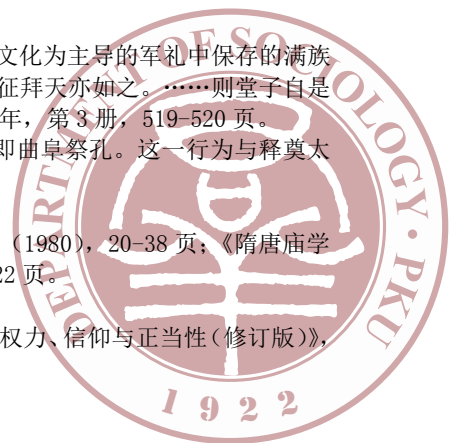
⁵ 包括《清史稿》未提及而在《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中记载的“遣祀阙里”，即曲阜祭孔。这一行为与释奠太学并建碑，都为雍正以后的凯旋仪式所继承，兹因篇幅关系，不作铺叙。

⁶ 《礼记正义》卷一二，《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1333页。

⁷ 高明士，《唐代的释奠礼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大陆杂志》第61卷第5期（1980），20-38页；《隋唐庙学制度的成立与道统的关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9期（1982），83-122页。

⁸ 《礼记正义》卷一二，《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1406页。

⁹ 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康熙皇帝推崇孔子的意识形态分析，可参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皇帝、儒生与孔庙》。



在洋行……行因释奠文教修”的说辞¹，御制的《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也提及：“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诗载。越我皇祖，征噶尔丹。命将禡旗，亦乙亥年。既符岁德，允协师贞。”²其四言铭文的内容和形式，不仅是对康熙武功与周宣王平淮的对接，同样也是对平定准噶尔的自许——这一点，毫无疑问存在着满清帝王以游牧关外而入主中原、寻求正统皇权的先天意识。

康熙的告成碑行为，继而为雍正所继承。《清实录》记载：

（雍正二年六月）乙酉，……礼部题请撰拟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国学，颁发直省，以昭功德。碑文曰……³。

雍正的《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因此也矗立在国子监，碑文交代勒铭的缘起，仍然以廷臣有请为借口而张扬“稽古典礼”的正统性：

廷臣上言，稽古典礼：出征而受成于学，所以定兵谋也；献馘而释奠于学，所以告凯捷也。宜刊诸珉石，揭于太学，用昭示于无极，遂为之铭曰……⁴。

乾隆皇帝也同样遵循了乃祖、乃父的告成方式，每次的边疆平定，都以告成太学碑的建立为终结。这一仪式，最早是在乾隆十四年的凯旋仪式中实现。《清实录》记载：

乾隆十四年己巳二月甲午，谕：“金川告捷，边徼安宁。大学士张廷玉、来保等查照《会典》，奏请升殿受贺。……现经蠲吉谒陵，并依典礼，遣官祭告。但从前青海平定，皇考世宗宪皇帝俯允廷臣之请，曾经举行朝贺典礼，具有成宪。著勉从所请，一切礼仪，该部查例具奏。”又谕曰：“大学士张廷玉、来保等以金川荡平，肤功迅奏，由朕指授机宜，应垂方册，请照皇祖圣祖仁皇帝平定朔漠、纂修方略之例，编辑成书。……著照所请行。”……军机大臣等奏：“平定金川，天威遐畅。请依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告祭典礼，遣官祭告坛、庙、社、稷，用荐成功。”从之。又奏：“圣祖仁皇帝平定沙漠，世宗宪皇帝平定青海，均御制碑文，垂示久远。金川平定，恭请御制文勒石太学。”从之⁵。

如上所载，乾隆与廷臣互相“启发”，以遵循皇祖、皇考的理由，其平定边疆的凯旋礼仪，以往的各种仪程一件不少地都被继承并丰富。因此《清朝通典》概括这一军礼仪式云：

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是年，议准凯旋礼。一曰告成之仪，经略大将军奏凯功成，应祭告天地、庙社、陵寝，释奠于先师孔子，勒碑太学，并命儒臣辑平定方略，以垂奕禩⁶。

那一年的《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也这样记载：“廷臣举皇祖朔漠、皇考青海成例，请勒碑成均，以示来许。”⁷其后《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武成而勒碑文庙，例也。礼臣以为请，故据实事书之。”⁸一方面推诿于群臣的请求，一方面托词于祖、父的成例；而事实上，乾隆对于告成太学碑的建立，较之康熙、雍正更为积极。赵翼（1727-1814）的《檐曝杂记》记载：

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神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⁹。

¹ 《西域图志》卷首“天章”，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9页。

²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九九，《清实录》第15册，278页。

³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一，《清实录》第7册，342页。

⁴ 同上注，343页。

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三五，《清实录》第13册，595-596页。

⁶ 《清朝通典》卷五九“礼·军·凯旋郊劳”，2441页。《清史稿》卷九〇承袭之，1768页。

⁷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三五，《清实录》第13册，597页。

⁸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九九，《清实录》第15册，277页。

⁹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圣学”一，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页。



赵翼入直军机处而目击乾隆御制诗文的回忆，敬仰情绪的表白之外，还揭示了两层事实：一是寻常碑记由属下具草，二是《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确实是由乾隆亲自撰写。而后一层事实，表达了乾隆对于平定准噶尔、对于告成太学两个事件的高度重视。

告成太学的凯旋礼仪，是有清一代帝王在军礼中的“复古式”创建。这一礼仪的重建，被后来的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圣武记》中慧眼独具地揭示出来：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上复勒铭狼居胥之山而还。朔漠平，至京师御门受贺，上亲撰碑铭，勒石太学。古帝王武功，或命将，或亲征，惟以告于庙社，未有告先师者，在泮献馘，复古制，自我圣祖始¹。

《圣武记》的写作，是魏源有感于鸦片战争以来“海警沓至”的国家危机，而以歌颂清代前期的武功来激发后世抵御侵略的意志。以勒石太学的方式恢复《礼记·王制》的理想制度而表达告祭先师、在泮献馘的含义，由他在撰述中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从撰写《圣武记》的创作动因而言，这毫无疑问是值得他为清代前期的文韬武略大书特书的创举。

然而，假托复古的名义在军礼中表达直接上古的道统、尊崇孔子的儒学这一理念，仅仅是告成太学的唯一目的吗？

四、告成天下——礼仪重建的终极目的

清代皇帝建立平定边疆而告成太学的纪功碑，是恢复周代礼制而释奠于学的表现。但在这一目标之后，告成碑更达到了告成于天下的目的。

太学是汉代以来在京师设立的中央最高学府，清代则从隋朝的改名，称为国子监、国子学；而在一些复古的场合，又以太学相称。唐代以来，中国古代的教育体制确立了“庙学制”的学政合一形式。从武德二年（619）开始，国子监内建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贞观二年（628），又停祭周公，仅释奠于孔庙²。在逐渐形成了“左庙右学”的国子监形制之外，唐代前期也将这一学制普及到州、县，使孔庙释奠礼仪在州学、县学中得到贯彻，而具有了“天下通祀”的儒学教育局面。同时，释奠礼仪也成为五礼体系中吉礼的一大类，与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并列³。因此，从唐代以来，国家的官学体制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释奠礼仪，成为精英文士通经问学、获得功名的必由途径。

清代在太学举行的祭孔释奠礼仪，也更为锦上添花。顺治以来的历届皇帝，均曾亲自参加太学的释奠礼，并创立所谓“临雍释奠”的亲诣行礼仪式。《清朝通典》概括：

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亲临视学，躬祭文庙。圣祖仁皇帝临雍释奠，典礼优隆。世宗宪皇帝尊礼先师，崇封五代，且又特定春秋亲祭之礼仪，文益为隆备。我皇上临御之初，加崇文庙，诏易黄瓦，继又重新殿庑，厘定题榜，特颁法物，以备礼器。凡春秋丁祀，屡经躬诣行礼。近又新建辟雍，亲临释奠，大典益昭。⁴

而对地方庙学的兴盛，也不无自豪地夸耀说：“伏惟我朝德化覃敷，崇尚儒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圣天子揆文奋武，拓地二万余里，昆仑濛汜，皆我胶鬲。文治之隆，亘古未有。”⁵可见乾隆时代的官员，已经将乾隆在告成碑中宣告的“拓地二万余里”说法作为“今典”而用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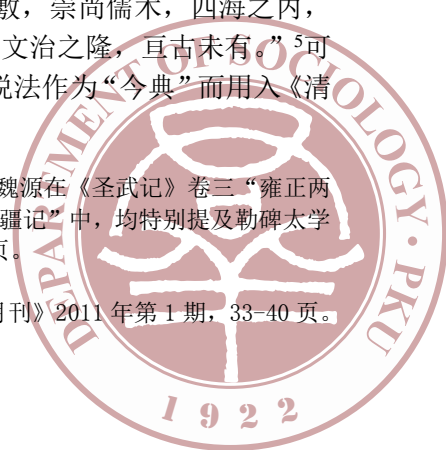
¹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魏源全集》第3册，118页。魏源在《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以及卷四“乾隆平定准部记”、“乾隆勘定回疆记”、“道光重定回疆记”中，均特别提及勒碑太学一事，可见其对此事的认可。参《魏源全集》第3册，137、153、162、184页。

² 《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635页。

³ 朱溢，《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类别归属的讨论为中心》，《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33-40页。

⁴ 《清朝通典》卷四八“礼·吉·释奠”，2309-2310页。

⁵ 同上注，2315页。



朝通典》的编纂中了。

康熙皇帝以来“告成太学碑”的建立，以健全《礼记》释奠制度为己任，而体现出复古崇儒的意旨。同样，他们也希冀通过这一精英文士荟萃的儒学之门，更大范围地宣传其平定天下的武功。这种意愿，自然也通过向地方庙学颁发碑文的形式来达成。如《清朝通典》记载：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颁御制平定朔漠碑文于直省学宫。

（雍正）二年六月，颁御制平定青海碑文于直省学宫。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颁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于直省学宫。二十年十月，颁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于直省学宫。二十六年六月，颁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于直省学宫¹。

将平定碑文颁发到各省学宫（即各省庙学）的广而告之意图，自然也为地方官员所领悟。《清实录》记载：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是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平定回部，御制告成太学碑文，请于畿辅九府、六直隶州，各照勒一碑。”得旨：“不必如此，保定立一碑足矣。”又奏：“请将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御制告成太学碑文，一并摹勒。”得旨：“是。”²

方观承（1698-1768）的这个上奏，比《清朝通典》记载的颁发日期要早，显然是碑文还没有颁到时即予表态，并且在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后，又一不做、二不休地上奏将乾隆二十年的平定准噶尔的碑文也要求一并摹勒。虽然在《清实录》上，我们看到的是方观承开启了地方造碑的先河，而事实上各地官员于此前后纷纷在从直省到府、州、县的文庙从事造碑邀宠的工程。原本仅仅是告成于中央最高学府——太学的碑文，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在全国各地文庙的造碑运动³。《清实录》在稍后的乾隆二十九年记录了这样一则有关各地造碑的谕旨：

十二月甲申。谕军机大臣等：“苏尔德奏‘平定准噶尔碑文各省学宫地势不一不必拘定尺寸并遴委通晓清文旗员摹写刊刻’一折。各省、府、州、县、卫学宫，自不能一律高敞，著比照部颁碑式竖立，转难位置适宜。至外省士子，本不谙习国书，碑内亦可毋庸令其镌刻。嗣后各学立碑，视该处采石难易及学宫地势，听其酌量随宜建竖，其清文竟不必刻入，兼可省传写错讹之弊。著于各督抚奏事之便，一并传谕知之。”⁴

这个谕旨的下达原因，是因为苏州布政使苏尔德（生卒年不详）在地方建立平定碑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了问题而上奏。地方立碑的主要困难是受限于各地的文庙格局而无法按照太学原碑尺寸摹刻、以及太学碑文满汉合璧而地方上摹刻满文难以保证准确。乾隆皇帝为此下达了各地庙学立碑可以不必拘于尺寸、也可以省略满文的谕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四年以前回复方观承的意见相比，乾隆皇帝似乎不再操心地方立碑会劳民伤财、不再告诫这一扩大化倾向仅限于行省庙学，而是批示了“各省、府、州、县、卫学宫”建立告成碑的因地制宜意见，纵容了这一浩大工程在基层学宫的展开；他还期待这一意见不局限于江苏一地，而“着于各督抚奏事之便，一并传谕知之”，即是要求逐一传达、覆盖到全国各地学宫的意思。在宽宏大量的背后，反映了乾隆皇帝对于地方建立告成碑只要达到为外省士子阅读目的的实用态度，以及急于求成、务必周知的迫切心情。——告成太学碑隐藏着的“告成天下”、特别是告成于汉族知识分子，才是乾隆皇帝所代表的清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真正目的。

告成太学的内容，主要是张扬大清的武功使得西北边疆已经成为中华一统的地理疆域，这是乾隆皇帝在平定回部之后上谕所谓“计道里则塞垣以外，更扩二万有余，论时日则军兴以来，不

¹ 同上注，2315页。

²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〇九，《清实录》第16册，850页。

³ 从目前所见地方残存平定碑的情况看，康熙三十七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均已见于一些地方府、州、县的文庙，可见平定碑在地方上的建立时间当在方观承奏报之平定准噶尔和平定回部告成太学两碑之前。具体的地方造碑过程，笔者当另撰《清代平定边疆立碑全国考》详论。

⁴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二四，《清实录》第17册，1067-1068页。



越五年之内”¹、御制《恭谒孝陵》诗“辟疆二万里，奏绩五年期”所要表达的意思²，也是刻写在《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中“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中“古不羈縻，今为臣子，疆辟二万，兵出五年”所要表达的意思。《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更以批驳放弃边疆的“守在四夷、羈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论调，而强调“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宣告清代中华帝国建立的新的疆域与民族概念。这个新的“共同体”概念如何成为知识精英、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共识，正是这一以复古为幌子而重建的凯旋礼仪最终达到的目的——由告成太学而实现告成天下的宣传攻略。

告成太学碑所能达到的宣传目的，确实为清代帝王所重视。因此再回首检视上述清代的凯旋礼仪，传统的在战争发生地建立纪功碑的措施虽然仍被实行，但远远落在了新的告成碑建立之后。如前所揭，康熙帝在三十七年平定噶尔丹的当年，即在国子监竖立了《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而在归化城的两块《敕赐归化城崇福寺碑记》，直到四十二年方御制颁赐。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等碑刻的建立，据《清实录》的记载，似乎到乾隆二十五年才开始施工³，直到二十七年八月，方“监造妥协”⁴。而此时，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告成碑不仅早在京师国子监大成殿阶前竖立，地方庙学的摹勒工程也已经风起云涌地开始实施。

五、结 论

如上所述，清代边疆战争的凯旋军礼由继承传统的刻石边地和告于庙社，以及以复古为名义而释奠孔庙和告成太学的创新共同组成。这个礼仪重建的过程，也是帝国新秩序的宣传渠道被创建的过程。

如果说传统的对于太庙的祭告，仍然措意于“我大清万年宗社无疆之庥”的帝王一家之天下意识的话⁵；那么，告成太学的祭告礼仪重建，则努力于将帝国江山的新秩序成为天下士子的共识。这个目的，毫无疑问是达到了。

我们不仅看到前揭翁方纲的《粤东金石略》已经著录下广东府学的告成碑，看到魏源的《圣武记》已经发现告成碑的独创性；而且，当平定准噶尔的事件发生之际，曹雪芹（1715-1763）在《红楼梦》里也以文学的笔法隐晦地称道这一事件时⁶；当龚自珍（1792-1841）在嘉庆二十四年就写下超越时代的《西域置行省议》时⁷；当沈垚（1798-1840）在道光初年“闭户家居”于江南一隅，却写下具有绝大识力的《新疆私议》时⁸，——可以相信，西域的疆土已经成为这些知识精英认定的中华帝国新的共同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影响其观念的因素里，一定有那些平定西北告成太学的碑刻，曾经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

¹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〇〇，《清实录》第16册，718页。

² 《西域图志》卷首“天章”，《西域图志校注》，32页。

³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〇一：“（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己巳，）又谕兆惠等：‘酌派官兵一千，来春往伊犁巡查，则刻石之事，自可兼办。今定长处既有工匠，著即发往叶尔羌，先行刻石纪功，俟工竣后，再同发往官兵前往伊犁，于格登山刻石。’”《清实录》第16册，743页。

⁴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六八：“（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己亥，）谕军机大臣等：‘阿桂等奏原任主事富魁带领匠作于固勒扎、格登山监造御制碑文事竣，可否量予奖赏等语，富魁前因获罪，留于军营效力，今既将固勒扎、格登山碑文俱监造妥协，富魁著加恩授为前锋，仍在本旗行走。’”《清实录》第17册，469页。

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八九，《清实录》第15册，136页。

⁶ 冯其庸，《〈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辑，1-9页。

⁷ 纪大椿，《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354-368页。

⁸ 孙夔，《沈子敦哀辞》：“著《新疆私议》……徐舍人松一叹曰：某谪戍新疆，凡诸水道，皆所目击，然犹历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闭户家居，独从故纸中搜得之，非具绝大识力，曷克有此？”沈垚，《落帆楼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影印嘉业堂本，卷尾，叶一背。

